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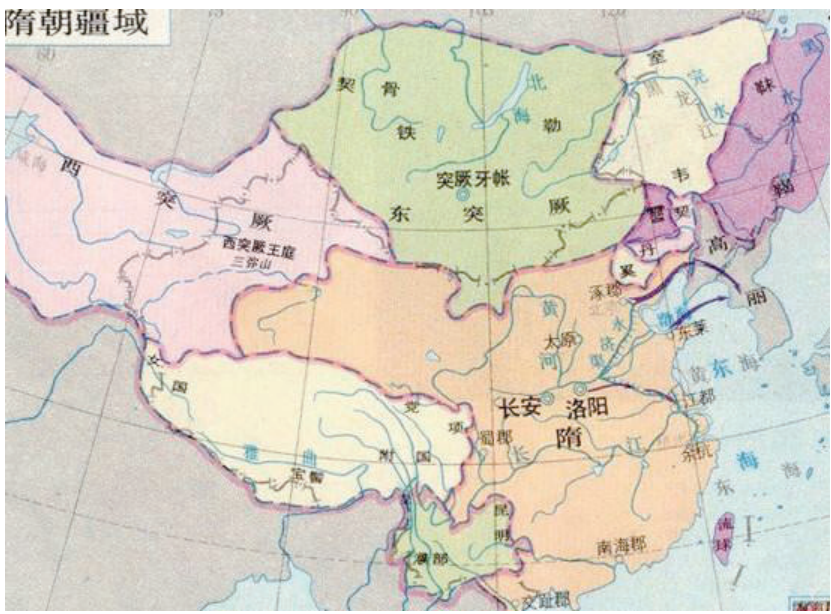
□ 丁 涛

隋朝（581年至61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短命”王朝，在其38年时间里，革新内政、再造一统、外攘“四夷”，迅速实现国力军力强盛，且多有创制、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海洋方向的经略，不仅极大地巩固了秦汉以降奠定的“陆海一体”格局，更是将对涉海疆域的统驭向海洋延伸，纳入整个王朝治理体系，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事实上，这种“拓疆域至四海，扬国威于远域”大刀阔斧的做法，极具战略眼光，也为以开放强盛著称的李唐王朝，提供了重要参照与有益借鉴。

贯通南北的陆海江交通网络

隋朝再造天下一统，面临的是近300年南北长期分裂的复杂局面，如何顺利且迅速地予以弥合，是当时最大的挑战。为此，隋朝君臣做了充分准备和精密筹划，完成武力统一后，迅速着力于密切南北在各个领域的联系，对原统治核心的江淮地区和情势较为复杂的岭南地区，予以重点经营；尤其是构建贯通南北的陆、海、江交通网络，加强对重要港口及沿线的管辖建设力度，为促进持续深度融合提供了战略支撑。

经过充分酝酿，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部署八路大军、五十余万兵力，分东西两个战区（东部为主战场，目标直指建康），陆、海、江三路并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灭陈朝；随后将战线推至情况复杂的江南及岭南地区，以武力威逼、政治招抚相结合，平定江南豪强世族残余势力的叛乱，清除岭南洗夫人集团的割据势力；把精简高效的州县两级制引入南朝故地，通达政令军令的同时，重



点加强了对沿海重要港口及其辐射区域的管辖，形成了东部以江都（今扬州）、余杭（今杭州）、会稽（今绍兴）为核心，南部以南海（今广州）为核心的两大区域，成为整个王朝海上交通及经贸的重要基地。

至炀帝大业五年（609年），江淮及岭南涉海郡已多达19个，势力范围已深入南海腹地。之后，隋朝廷又集中开凿广通、通济及永济等重要河渠，贯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及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了内陆运输水系与沿海区域的联系，连接了北方政治中心、边防前阵地与江淮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了江海一体化的格局，构建了一条纵横南北的繁荣经济带。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于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动工开凿的永济渠，具有明显的战略目的，对北线及东北方向的防卫体系构建，尤其为兵员及辎重的输送往来，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

面向海洋深入经略对外关系

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再次建立，也为重新评估、调整稳固与周边各国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伴随航海能力的显著提升及海上交通线路的进一步开拓，隋朝经略四方，除却传统

隋朝经略海洋的历史启示

意义上对陆地边防保持高度关注和持续经营外，更加积极地将眼光投向海洋，获得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and 更为广阔的运维空间；尤其是将寻求与周边临海邦国建立友好关系，纳入确保王朝总体安平的体系中统合考量，取得了远超秦汉的成效，甚至连唐朝魏征也给予其“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的高度评价。

《隋书》“东夷”及“南蛮”列传等记载了隋王朝与周边政权的交往，比较重要的有高丽、新罗、百济、倭国以及林邑、赤土等；如开皇初年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维持了东北方向相当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在炀帝“求访异俗”的授意下，主动与流求（或为今台湾岛）的三次直接接触，虽以“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告结束，但对东南方向相关岛屿的探索，为后续李唐王朝建立实质性管辖权打开了局面；再如大业三年（607年），倭国派遣使团求学佛法，炀帝安排裴清进行回访，经由朝鲜半岛西岸、至珍岛，过对马岛、一岐岛抵达北九州，了解了沿线各国基本情况，这条线路也成为通往日本诸岛的主要航线之一。南海方面，文帝于仁寿末年，遣兵万余讨伐多年不贡的林邑（今越南南端）、重建朝贡关系的同时，打开了通往东南亚诸邦的海上环线，实际产生的影响已覆盖周边十余国。

需要指出的是，对流求、林邑陌生海域的跨海用兵，清晰地记载了出发港口即义安（今潮州）、南海二郡，可以想见隋朝对具有潜在隐患的近海

区域，在港口设置上除考虑一般意义上的交通功能外，还极为重视其相应海防功能的发挥。

准确把握涉海疆域的军事重心

近300年的长期战乱，使东北方向的安全局势变得尤为复杂。至隋时，高丽已并吞辽东半岛直逼辽西，同时还出现了多个实力较强的部族，如与隋接壤的奚、契丹，与突厥相连的室韦、位于高丽北部的靺鞨。隋朝准确把握了辽东半岛在维护区域秩序的战略地位，发展汉代以来“以夷制夷”方略，采取恩威兼济、远交近攻举措，加强友好往来，积极寻求地区安全协作，并针对性地使“夷狄”相互牵制掣肘；同时，构建水陆并重、江海一体的安防体系，陆上以贯通南北的河渠作为运送兵员辎重的交通要道，海上于山东半岛营建造船厂及战舰出海港口。

从经略过程来看，做到了有礼有节，较好地调控了与高丽的关系。如文帝时，针对高丽既已受封、又与南陈暗中勾联的情况，先是以玺书训诫；后其又领靺鞨骑兵万余入辽辽西，文帝方才决意兴兵30万予以讨伐，虽因军中疾疫止步辽水，但震慑作用已成，旋即收兵。至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发觉高丽私通突厥启民可汗，遂令其使者转达“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若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不同于史籍的秦始皇形象

——从秦始皇陵考古看秦文明（一）

□ 段清波

秦始皇帝陵由陵墓本身、陵园和陵区这三重空间构成。经过40年的考古工作，我们获得了对秦始皇陵园、秦始皇，乃至对秦文明的新知，这些新知与此前从《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得到的秦文明的形象有所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着我们对秦历史进程的认识。

秦始皇在汉代的形象

古往今来，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坊间传闻，秦始皇始终是一个暴虐、贪婪的帝王形象，“焚书坑儒”“大兴土木”等劣迹罄竹难书，秦朝也被看作是一个暴政的时代，严刑峻法，残酷无情，民怨沸腾。

《史记》记载的尉缭对秦始皇的评价广为流传，“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其他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2200年来，“秦始皇”已由一个帝王称谓，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概念，成为暴君的指代，秦也成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极端象征。

汉承秦制，汉的法制比秦更全面、完善，从对比研究角度，将秦定义为一个暴政的时代，不免有失偏颇。《史记》谈及汉初统治者应以秦亡为戒的事例有81处，指责秦始皇暴行暴政的则高达67处，这些多数是秦始皇后五年发生的。汉代学者之所以如此强烈地指控秦始皇，真实用意是为争取民心，并以亡秦为戒，着意于敦促和警醒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吸取前车之鉴。

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秦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以批评的口吻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他专权独断，

行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裁决。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勤勉努力的皇帝伏案工作的形象，他精力旺盛，事无巨细。“石”是古代对重量的计量单位，秦始皇批阅的是简牍，“一石”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公斤，据学者研究，秦始皇每天阅读奏章并批示的文字达30万字。

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开始巡幸帝国领土，在位11年，先后出巡5次，第一次是向西北行，其余4次都是向东南行，除西南边地和岭南地区外，秦始皇一生的足迹达38郡，最后在第五次出巡途中崩逝。2000多年前，这是一件相当有气魄的事情。

不局限于领土的统一，秦始皇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中央集权制扩大到整个帝国的疆域范围，这其中，通过出巡强有力地宣传了帝国的新政，同时宣威天下以使六国从精神上彻底对秦臣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出巡来垂询地方行政教化，既巩固了秦国的统治，更极大地推动了对东方六国，尤其是东南地区在国家制度和文化上的整合，这对奠定此后秦汉文明形成的根本基因意义非凡。秦始皇亲自去泰山封禅，有针对性地整合了黄河中下游文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对黄河流域和中原文明原本是不认同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文化的整合直到王莽时才彻底完成。

秦始皇一生中重大的决策失误，都是在他人生最后的5年里，包括修秦始皇陵、长城、阿房宫、直道，以及开发岭南，急于求成之下，大规模的非生产性活动使得国家经济几近崩溃。

秦始皇陵修建历时大概10年

《史记》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丽山。”学者们认为，秦始皇13岁当秦王后不久即开始修建陵墓，而他的儿子将他埋葬后又修建了近2年，那么秦始皇陵前后总共修建时间就是近40年。但《汉书》也说过，秦始皇陵的建设是“旷日十年”。陵园内外陪葬坑的建造方式、陶俑的制作和

彩绘方式，以及有戳记与文字性的遗存都表明，陵墓的营造应在秦统一之后，目前所看到的陵园遗存应是一个短期行为的结果。

考古发掘提供了一些证据。在修陵人墓地中，发现一些覆盖在尸骨上的瓦书，文字内容标记了死者姓名和籍贯，这些修陵人来自各地，有秦国本地的，更有来自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的。统一那一年齐国才最后被灭，说明齐国工匠能来到这里一定是统一之后的事情。此外，秦人经历了从秦国到秦帝国的变化，前后能调配的资源以及管理机构是不同的，而陵园内外筒瓦、板瓦上的戳印文字，显示出官府机构名称一致，表明这些建筑材料制作的年代也处于帝国时期。

李斯担任丞相的时间节点事关秦陵修建时间的长短。统一之时，李斯是廷尉，曾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秦始皇二十八年，陪同秦始皇东巡时，李斯是卿；三十四年，为秦始皇祝寿发生焚书事件时李斯的身份是丞相，可见李斯担任丞相的时间，在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之间。《汉旧仪》记载丞相李斯曾上报给秦始皇一份奏章，表明他以丞相身份主持陵墓建设时，“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得到皇帝同意后陵墓位置迁址而建。假如李斯是三十年左右担任丞相的，而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那么，秦始皇陵的主体工程，包括陵墓本身、大量的陪葬坑、陵园以及陵园地面上的建筑等，都应是李斯当丞相之后的所为，这个时间段大致就是秦始皇死前的几年时间，而被后世诟病的大兴土木事件等，也都发生在这几年里。司马迁在这里提及秦始皇，是要借由秦始皇而给汉武帝提醒、谏言，这种“影射史学”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十分常见。



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是最诡异另类也最变幻莫测的特殊时代，是人的意识空前觉醒、人的精神自由极大释放、人的生命价值充分张扬的时代。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鉴于长时段的军阀混战、无休止的政治争斗，以及此消彼长的门阀士族的权利角逐，使得当时官宦显贵和文人士子都陷入充满隐患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一方面据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良田，另一方面又担心在纷乱不安的社会动荡中丢弃财物甚至性命，安逸享乐与困顿担忧、旷放达观与忧戚不安、贪恋人生欢愉与害怕死亡到来，所有这些交织成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图景，这就是为后人经常言说的魏晋风度。

如果想详细明晰地了解魏晋风度，进而知晓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和精神状貌，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无法绕开的重要著述。《世说新语》以形象生动的笔触、简洁优美的文字和详实准确的史料，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东汉末年、三国期间、两晋阶段重要人物的逸闻趣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庶僧道，均在该书有所呈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200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潮流风尚。该书编撰者刘义庆天资禀赋极高，深受儒家文化滋养，喜欢招贤纳士，在当时享有美誉盛名。《世说新语》根据内容分类编排的36门中，其中上卷4门依次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无疑浸润着儒家“孔门四科”的神韵和遗风，表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着尊崇孔儒的一面。但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表述及蔑视礼教的观点，不难看出刘义庆和他属下的编者，持有与正统儒家不同的新异见解，呈现出魏

晋时代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

魏晋时代是一个彰显文化价值的历史时期，其时文人们多为饱学之士，但囿于当时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纷纷转向务虚空谈，我行我素、鄙视礼俗、任意而为，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修行，追求高妙人格和高蹈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别样展示和畸形流露。由于《世说新语》记载了嵇康、刘伶等诸多名士的传奇人生，特别是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因而该书是研究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史料。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需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世说新语》一书从“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三个维度，对魏晋士人的风流群像进行了描摹和勾勒，展现了魏晋时代上层社会率真任性、自然适意的性格和优雅脱俗、任诞放达的混乱时代，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精神依归，但既不能像老庄那样愤世嫉俗，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道统。于是，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教义，把三家教义改造成适合自己生存的清谈玄学。

魏晋风度是魏晋文人士子所独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集中反映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与政治权力相互碰撞的无奈与痛苦。以阮籍、刘伶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纵酒解忧，消解悲情，气韵生动，挥洒自如，绽放着至真性情，追求着诗意的生活，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所以有人说魏晋晋风度犹如《世说新语》中的一杯美酒，既浓烈又温婉、既甘甜又苦涩，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令人陶醉。

但是，《世说新语》中记述的名士们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尚可接受，假若整个社会都加以膜拜效仿，其结果将难以理喻了，例如书中记载的一些附庸风雅者们，刻意模仿名士的表象，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 刘金梓

把酒持螯，放浪形骸，无视礼法，丑态百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言行为时人所诟病，为后人所唾弃。可以说，魏晋两朝的连败连亡，在很大程度上与魏晋风度及其负面影响有着直接关系，这种极端利己的魏晋思想和极不负责任的魏晋风度，是对封建高压统治和儒家礼教束缚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成为魏晋政权迅速垮塌的加速器。

